

徐迺翔
黄万华

中国 抗战时期 沦陷区文学史

福建教育出版社

中国抗战时期沦陷区文学史

徐迺翔 黄万华著

福建教育出版社

1995年·福州

(闽)新登字 02 号

中国抗战时期沦陷区文学史

徐迺翔 黄万华著

*

福建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福州梦山巷 27 号 邮编:350001)

福建省新华书店经销

福建三明地质印刷厂印刷

(三明市富兴路 15 号 邮编:365001)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22 字数 530 千字 4 插页

1995 年 7 月第 1 版 1995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500

ISBN 7—5334—1933—2/I·145 定价:34.40 元

如有印装差错,可向承印厂调换

序

贾植芳

由于特殊的历史因缘，中国现代文学成了众所周知的“劳动密集型”学科，不过，这也更反衬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的一个无法回避的缺憾：我们数千人的研究者队伍竟然至今未写出一部完整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之所以可以这样说，是因为在我们以往的文学史教科书中，一直存在着一片较富耕耘价值但却一直未被开垦的空白地带——沦陷区文学。

不过，近几年出现的一些可喜迹象已开始预示这种局面行将改观。我们高兴地看到，不少学界有心人已开始致力于对沦陷区文学的研究；我们更加高兴地看到，这些有心人的学术成果正在陆续破土而出。我们不无理由相信，中国现代文学很快就会以非“残疾”学科的面貌凸现在世人面前。在此，我们不得不对填补了中国现代文学中“沦陷文学”研究这块空白之地的研究者表示敬意和谢意。——也正是出于这样的原因，当徐迺翔、黄万华同志嘱我为他们合著的《中国抗战时期沦陷区文学史》题序时，我才不敢稍表辞意，而只能尽我这个年过八十的老人的微薄之力为他们的努力及收获摇旗喝彩，并将他们 51 万字的大著推荐给读者。

从作者寄来的简目和部分文稿中，可以见出该书的诸多不同凡响之处。首先，该书的探讨范围覆盖了东北、华北、华东等多个沦陷区，这较之于已面世的一些囿于个别沦陷区的有关论著，堪称首创。其次，作者在对沦陷区文学进行探讨时，并非孤立地研究，而是放在整个抗战文艺的大背景上进行全面地、系统地描述和品评，既清晰地勾勒出了沦陷区文学的整体框架，也客观地再现了各个沦陷区诸多复杂的历史现象。再次，在对沦陷区文学这一新拓的文学史阐释空间进行解析时，作者能以历史主义的治学态度、开放的文化心态，客观而公允地衡估其特殊的历史地位、文学蕴涵和审美价值。另外，作者搜集资料之丰富、甄别史料之细致，也堪称独到。据我所知，徐迺翔同志早在六十年代初期，就开始注意搜集和积累这方面的资料，他当时已到文学研究所工作，这就为他的搜集工作提供了方便的环境和条件。而该书的另一作者黄万华同志自1986年开始着手东北沦陷区文学研究之初，就全力搜集有关资料，后来，他又跑遍了东北、北京、上海、南京等地的图书馆，查阅了大量的报刊图书。而在广泛掌握资料的基础上，两位作者又做了认真的研读，从而使该书真正成为了一本资料详实、涉猎广泛的佳构。

当然，白璧难免微瑕，该书也有美中不足。如：作为沦陷区文学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的日据时期的台湾文学和沦陷区中的日裔作家“反映”沦陷区生活的文学创作尚被付之阙如。并且，这一时期，由于创作的发表与出版受到敌伪势力的严密钳制，沦陷区的作家、学者往往转而从外国文学作品的译介，藉他人之口宣泄自己的爱国抗敌心绪，因而当时的翻译文学曾呈一时之盛。而翻译文学，则又是中国近现代文学建设事业的一个重要方面，它和文学创作同样是构成我国近现代文学历史格局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所以，我觉得，如果本书再版时能将翻译文学纳入探讨范围之内，将更臻完美。

也许不应忘记本书出版的时间：公元 1995 年。50 年前，我们的民族、我们的文学经历了一场多么酷烈的血与火的洗礼呵！但愿我们对沦陷区文学的反思能与我们对历史的反思溶汇在一起，使我们永远警醒，以使我们的文学甚至我们的民族免于再陷魔淖的劫数。

然而，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是明智的，也并不是每一个人都敢于正视历史。今天，半个世纪前的灾难的身历者尚未死绝，被炎黄后裔的鲜血染红的历史烟云尚未散尽，而日本朝野的某些右翼势力却已开始在那里大造“进入”中国、“开发”中国、“南京大屠杀”是中国人的“捏造”等等自欺欺人的现代神话。而我，这个曾亲身投入过那场血火交融的残酷的战争并品尝过日伪政权的铁窗滋味的老人，能趁给两位同行的大作题序时说几句话，聊以警醒世人，也许不乏意义。

是为序。

1995 年 6 月于上海寓所

前 言

本书想以对一些历史事实的回顾开始对沦陷区文学历史的描述。

1945年11月，抗战胜利后不久，上海曙光出版社编辑出版了《文化汉奸罪恶史》，其中一个主要内容，是“于一些文化汉奸们，也加以个别的叙述”。被列名于书中的“文化汉奸”皆上海文学界人士，共17人，其中自然不乏名副其实的落水文人，如张资平。但编者将关露、张爱玲、潘予且、苏青等也一概视之为“文化汉奸”来加以叙述。

当时被视之为“落水”文人的并不限于上述书中所列人物，如著名作家谭正璧也被置于此列，以致他在1945年11月7日通宵达旦写下了一篇为自己辩护的长文，这里不妨摘要如下。

谭正璧言：“有一种严重的力在压迫着我，8年来一言难尽的困苦生活没有把我磨折死，而这一种力却在威胁着我此后的生存，于是我不能不把这几篇曾在各种不同的刊物上发表过的文章重印出来，让大家来作公平的判断，因为‘事实胜于雄辩’。”

“在上海完全成为不自主土地以来的4年中，我为了生活，曾经写过许多别的人文所不愿写的文章，其中十九都和历史有关，有论文，有小说，也有剧本。在尽可能范围内，我始终抱着两个主旨：一是借题灌输抗战意识；一是借事来暴露敌伪丑恶。”

谭正璧在较详尽地叙述了他的文章“大半发表在与敌伪不无多少关系的刊物上”而遭到的删改、牵累编者等事情后说：“我以为如果一个做地下工作的人，为了工作上的必要，而不得不混到敌伪

组织里面去，国法不以为有罪，那么我虽然不是奉命而行，而把这种普通刊物所不能发表的文章在与敌伪有关系的刊物上发表出来，在我良心上是万分可告无愧的。”

在这篇长文的结尾，谭正璧不无激愤地写道：“我认为莫大遗憾的，就是在敌伪势力笼罩下的文坛上，反而从不曾有人目我为他们的同类；到了现在应该分别黑白的时代，反武断地置我于我向所不屑与之为伍的什么文坛健将之林，那即使砍去我的头颅、夷我的十族，我也不甘于承受。而且因此使我深深后悔，我不曾学那真的存心只为着稿费，而始终不露他的真姓名写稿的人。因为假使当时我也这样做，至少可以不致引起敌伪的注意，而且还可以写些阿谀敌伪的文章来博取较高的稿费，而又永远没人加我以什么文坛健将的丑号。如果做得十分秘密，到了现在，还可以摇身一变，而博得忠贞文人的荣名。但是在我，如果真是这样做时，虽然或许可以一时微幸免去别人的指摘，可是良心的责备，将使我终身感到莫大的痛苦而无以自拔，我还是绝不愿意这样做的。”

上面提及的关露、张爱玲、潘予且、苏青、谭正璧等作家在沦陷时期的活动情况各异，本书后面章节都会一一叙述，历史的真相将会逐步一目了然。这里所以不厌其烦地引用谭正璧的叙述，是想表明沦陷区文学历史确有澄清并重新加以真实的历史描述的必要。在日寇入侵中国的那场历史大灾难中，沦陷区文坛风云变幻复杂。作家中，固守民族气节、一身清白者有之，文而官者、文而痞者也有之。但如果简单地运用这种两值判断，并不能客观清晰的描述出这段文学史的真实面貌。在抗战刚刚结束的年月，以是否在同敌伪有染的报刊上发表文章作尺度来衡量作家的忠奸曲直，其中包含的强烈民族意识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今天我们重新审视这段历史，应该指出，当时作家同各种背景复杂的刊物发生关系，本身有着复杂的情形。助纣为虐者有之，但或奉命而行，或受自己的民族意识

驱使,利用背景复杂的报刊来求得进步文学的生存者,也大有人在。即便有的作家当时因人事联系上的情况复杂,甚至同日伪文化势力不无来往,但其作品表现生活,往往并不直接指涉现实政治。今天我们在实事求是剖析其当时的社会关系的同时,也仍有可能,且有必要从文学范畴来认定他们的得失。

沦陷区文学的复杂,也使国内外学术界对此的看法一直存在着严重分歧。国外有的学者对沦陷区文学评价颇高,如认为1937年至1945年中国真正有价值的现代文学是产生在沦陷区的作品^①;而国内学术界在较长时间里则对沦陷区文学漠然视之。面对如此大的分歧,将沦陷区文学放在大的历史背景进行整体、宏观和多视角的综合研究,真正从史的角度揭示出沦陷区文学的总体发展面貌,就显得十分必要了。

1989年,笔者刚刚涉足沦陷区文学研究领域时,将这一课题的基本内容规定为:在抗战时期文学的背景下,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采取史论结合的方法对沦陷区文学进行总体研究;在全面搜集和整理长期被湮没的沦陷区文学资料的基础上,从“史”的角度重点探讨几个能从不同侧面反映沦陷区文学基本面貌的问题,例如,它同整个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关系,它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特殊地位,它同同一时期国统区、解放区文学的异同,它构成上的多样性,它在文学创作思潮上的“回归”等;同时,具体考察和研究一些较有影响的创作现象、作家作品和社团流派等;力求在中国现代文学史的整体发展中来辨识沦陷区文学的源流、演变和发展,科学地揭示其本质特征和历史价值。几年来,我们的认识有所深化,但研究内容基本上是在上述范围内进行的。

^① 参阅小爱德华(美)《被冷落的缪斯——1937至1945年的中国现代文学》。

这本《中国抗战时期沦陷区文学史》，作为笔者沦陷区文学史研究课题的一个成果，较多地侧重史料和史实的辨识、梳理、提炼、升华和阐释。沦陷区文学由于其自身的历史特殊性，一度使研究者们望而却步，其中史料的极端匮乏、长期散失，是一个重要原因。因此，我们力图把钩稽史料、强化史实，提纯史料的价值，作为研究的最重要工作来进行，实践恩格斯关于科学研究不能“从纯粹思维出发”，而“必须从最顽强的事实出发”的重要思想，从而使对沦陷区文学的历史描述建立在翔实的史料基础上。

作者

1995. 3. 1

目 录

第一章 沦陷区文学的背景和分期	(1)
第一节 沦陷区文学产生的背景	(1)
第二节 第一个历史时期的文学概况	(6)
第三节 第二个历史时期的文学概况	(9)
第四节 第三个历史时期的文学概况	(16)
第二章 作家的创作心态和文学的基本特征	(24)
第一节 沦陷区文学的构成	(24)
第二节 沦陷区作家的创作心态	(26)
第三节 沦陷区文学的基本特征	(32)
第三章 东北沦陷初期(1931—1937)的文学	(38)
第一节 文学社团的蜂起和东北文学的复苏	(38)
第二节 “夜哨”作家群的文学活动	(51)
第三节 金剑啸、萧红、萧军等的创作	(56)
第四章 东北沦陷中期(1937—1941)的文学概况	(69)
第一节 日伪文化专制政策的实施	(69)
第二节 文学论争中开拓的创作新局面	(73)
第三节 流派性质对峙中的文学社团	(79)
第五章 东北沦陷中期的小说创作	(88)
第一节 艺文志派的小说创作	(88)
第二节 东北乡土文学和山丁、秋萤的小说创作	(115)
第三节 “大北风”作家群和关沫南等的小说创作	(131)

第六章 东北沦陷中期的诗歌创作	(143)
第一节 诗歌刊行会作者群的诗作	(143)
第二节 诗季社作者群等的诗作	(149)
第七章 东北沦陷初、中期的散文	(159)
第一节 文风犀利的杂文创作	(159)
第二节 “炼狱”生活中的抒情散文	(166)
第八章 华北沦陷前期(1937—1941)文学概况	(171)
第一节 校园、民间、官办期刊并存的华北文坛	(171)
第二节 生机和危机并存的文学思潮	(187)
第三节 文化统制下的外来文学交流	(192)
第九章 华北沦陷前期的小说	(198)
第一节 张秀亚、赵宗廉等校园作家的小说创作	(198)
第二节 毕基初等的山林、乡村小说	(205)
第三节 张金寿、萧艾等的都市小说	(214)
第四节 北派通俗小说的兴盛	(225)
第十章 华北沦陷前期的诗坛	(235)
第一节 华北沦陷前期诗坛概貌	(235)
第二节 交织着“大地”和“温室”气息的新诗创作	(239)
第十一章 华北沦陷前期的散文创作	(247)
第一节 华北沦陷前期散文创作走向	(247)
第二节 小品创作的两股潮流	(251)
第三节 北京文坛台湾作家三剑客	(256)
第十二章 东北沦陷后期(1941—1945)文学概况	(263)
第一节 “艺文指导要纲”的颁布和官制文化的加强	(263)
第二节 沉潜中曲折求生的东北文学	(267)
第十三章 东北沦陷后期的小说	(272)
第一节 小说新秀杨慈灯等的创作	(272)

第二节	吴瑛、但娣等女作家的小说	(281)
第十四章	东北沦陷后期的散文创作	(293)
第一节	议论性散文艺术的深化	(293)
第二节	“杂”中求生存的抒情散文	(297)
第十五章	东北沦陷后期的诗歌	(303)
第一节	在乡土味中继续吟哦的诗作	(303)
第二节	超越“闺怨诗”的女性诗歌	(308)
第十六章	东北沦陷时期的戏剧	(313)
第一节	戏剧活动的滥觞和兴盛	(313)
第二节	时代特色和地域特性相结合的剧作	(316)
第十七章	华北沦陷后期(1941—1945)文学概况	(321)
第一节	文学中兴中的出版和报刊	(321)
第二节	纷争纠结的文学思潮	(328)
第三节	生存于政治干涉和文学追求间的社团	(340)
第四节	“决战”姿态下的外来文学交流	(347)
第十八章	华北沦陷后期的小说	(354)
第一节	袁犀和华北满洲作家群的小说创作	(354)
第二节	雷妍、梅娘等女作家的小说	(364)
第三节	关永吉、马骊等乡土小说创作	(384)
第四节	题材多样化的都市生活小说	(398)
第十九章	华北沦陷后期的诗歌创作	(411)
第一节	“化古”、“化洋”中诗歌艺术的锤炼和吴兴华的诗作	(411)
第二节	华北其他青年诗人的创作	(420)
第二十章	华北沦陷后期的散文创作	(427)
第一节	变化中的“个人性”小品创作	(427)
第二节	知识性小品的创作	(434)
第三节	周作人散文随笔：深渊中的吟哦	(437)

第二十一章 华北沦陷时期的戏剧	(446)
第二十二章 华东沦陷区文学概况	(455)
第一节 南京地区文学概况	(455)
第二节 上海沦陷时期(1942—1945)	
报刊的消长和文学力量的聚合	(461)
第三节 泾渭分明的文学思潮中形成的创作格局	(487)
第二十三章 华东沦陷区小说	(492)
第一节 师陀、沈寂、郑定文等小说:现实主义艺术的突破	(492)
第二节 都市题材小说的新拓展	(505)
第三节 予且、谭正璧等的通俗小说创作	(522)
第四节 苏青、施济美、汤雪华等的女性小说	(539)
第五节 张爱玲:出入于“雅”、“俗”间的才女	(551)
第二十四章 上海沦陷时期的戏剧创作	(559)
第一节 在现实主义传统中复苏的话剧创作	(559)
第二节 喜剧的“热闹”和杨绛、鲁思的创作	(567)
第三节 民族精神的潜行:孔另境、魏于潜等的历史剧创作	(574)
第四节 戏剧艺术的再创造:师陀、李健吾、顾仲彝等的改编剧	(580)
第二十五章 上海沦陷时期华东沦陷区散文	(589)
第一节 华东沦陷区散文创作的基本格局	(589)
第二节 学者言志散文的创作	(593)
第三节 抒情叙事散文的创作	(605)
第四节 杂文和报告文学	(619)
第二十六章 上海沦陷时期的诗歌	(632)
第二十七章 沦陷区的文学理论著述	(645)
第一节 东北沦陷区的文论	(645)
第二节 华北沦陷区的文论	(650)

第三节 华东沦陷区的文论	(655)
第二十八章 武汉等沦陷地区的文学概貌	(661)
第一节 武汉沦陷时期文学概况	(661)
第二节 华北其他各地的文学概况	(668)
附 录：汉奸文学简析	(673)
后 记	(679)

第一章 沦陷区文学的背景和分期

第一节 沦陷区文学产生的背景

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起,到抗日战争胜利,中国东北、华北、华中、华东、华南地区先后沦陷,其地域广阔,且包括文化中心城市北京、上海、南京、武汉、广州、天津、长春等。这些地区沉陷时期出版的作品集在600种以上,文学刊物(包括以文学为主的综合性杂志)在150种以上,有影响的作家有百余人,报纸副刊、文学社团此起彼伏,文学思潮纷繁复杂。理清这些历史线索,必须要将其置于全民抗战的总背景上,而首先要把握的是异族统治和民族意识潜行的现实政治环境。

沦陷区异族文化统治的局面是严峻的。沦陷初期,日伪当局往往是动用政权机器,从外部强化对文艺的法西斯统治。1941年日本经济出版社出版的《满洲建国侧面史》称日伪文化为“官制文化”,正可以概括日本侵略者力图通过政权力量来严格统辖沦陷区文化事业的法西斯本质。1932年伪满颁布“出版法”;1937年伪满成立弘报处统辖文化宣传,并查封颇有影响的7大中文报刊;1938年日本华北驻屯军以其宣传机构武德报社来收罗文化汉奸,统制文化阵地;1941年末上海原有出版机关和新书业公会悉遭封闭,20余种杂志、10余种报纸停刊等等,都可以视作强化殖民文化统治的政治。但到后来,日伪当局开始重视对文学本身的渗透。满洲

文艺家协会(1941年)、华北作家协会(1941年)、武汉文艺协会(前身武汉作家协会,1940年)、南京中国作家联谊会(1940年)等都不乏官方色彩。1942年11月、1943年8月、1944年11月连续三次召开的“大东亚文学者大会”,更是力图将文学捆绑于日伪“圣战”的兵车上。然而,这些以强权政治作后盾的控制、影响,并不能决定沦陷区文学的性质。沦陷区文学以其潜行的民族正气、继承的文学传统,表明着其产生的民族历史背景。

在各沦陷区,中共不仅以其领导的抗日武装斗争潜在影响着沦陷区文学的创作面貌,而且一直在思想文化战线上积极影响、团结着沦陷区作家。比如,在东北沦陷区,中共党员田贲组织过“鲁迅文学研究会”(1941年),中共党员佟醒愚、秦占雅领导过“哈尔滨马克思主义文艺学习小组”(1940年),而著名的北满“夜哨”作家群更是以中共党员罗烽、金剑啸、姜椿芳、舒群等为核心形成的。上海“孤岛”沦陷后,中共上海地下党贯彻“勤学勤业交朋友”的文化策略方针坚持斗争,打入敌伪文艺报刊进行斗争者有之(如关露1940年春编辑《女声》月刊,袁殊、恽逸群1942年复刊《杂志》等);巧妙利用上海环境的历史条件,创办进步刊物,抵制日伪文化控制者有之(如姜椿芳1942年11月以苏商时代社名义创办《苏联文艺》,柯灵1943年6月接编《万象》等);结社组团,以现实主义抗衡日伪文学者更有之(如戴耘根据中共上海文委指示,1942年8月组建华艺剧团,1943年9月组建同茂演剧社;白文、王季琛等遵照中共上海小剧场支部指示,参加上海艺术剧团等)。在武汉沦陷区,一批思想倾向革命的文学青年钱锋、吴乙天、朱家启等,于1943年、1945年分别成立“文艺生活社”、“武汉文学社”,自费出版进步刊物。正是中国共产党对沦陷区文化思想战线的领导、影响,使得这些地区的进步文学始终在较深的层次上同高举民族解放旗帜的中国现代文学一一呼应着。